

收稿日期:2022-12-03

## 超越“第二性”:门罗小说中女性成长剖析

王妤彤,黄德志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爱丽丝·门罗关注日常生活、善于捕捉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她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多“自为存在”的女性角色,描写她们的生存境遇,展现她们通过自我反思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实现自我超越的人生历程。在《亲爱的生活》中,门罗再现了20世纪三种较为典型的女性生存情境,呈现了女性突破既定情境获得成长的过程,表达了与波伏娃《第二性》中存在主义女性观相近的女性观念,为当代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爱丽丝·门罗;《亲爱的生活》;波伏娃;《第二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4-0119-06

**作者简介:**王妤彤(1998—),女,江苏无锡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黄德志(1970—),男,江苏丰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4.059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创作短篇小说见长,已出版14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作有《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逃离》《石城远望》等。美国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称她是“当代的契诃夫”<sup>[1]</sup>,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也称赞她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sup>[2]</sup>。

门罗始终致力于书写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轨迹,将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中的情感经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在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通过自由选择不断超越自我、追求自由、探寻人生本质的女性角色,展现出女性作为“自为存在”的人所具备的超越性:即便受到父权制的束缚,女性也可以凭借自我超越、自我拯救,突破给定的“他者”身份,实现自身价值。同时,门罗并未放弃伦理道德方面的思索,认为女性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门罗小说中的女性观与波伏娃《第二性》中阐释的存在主义女性观十分契合。

在门罗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离开马弗里》《亚孟森》和《庇护所》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展现了20世纪女性三种较为典型的生存情境。本文将结合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存在主义女性观,分析这三篇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情境以及她们做出的自我选择,探讨选择背后的深层意义。

## 一、波伏娃与《第二性》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 — 1986),是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为存在主义女性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二性》是波伏娃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借用生物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概念,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自古至今女性的处境,可以看作一部从女性整体角度探讨“女人是什么”和“女人应该是什么”的哲学伦理学巨著。《第二性》的核心观点是女性被塑造为绝对的他者,女性气质是被建构的。

“情境”是波伏娃思想的重要概念,被赋予了比通常所说的“周遭环境”更加丰富的意义,是个体介入世界时其自由所要遭遇的现实性。而“现实性”指的是凭借人作为个体的理性无法改变的外部世界和过去,具体表现为个体情境中那些无法选择的方面,如出生、身体、其他人的存在、死亡等现实因素。情境是将“绝对自由”的意识和无可选择的现实性紧密相连的黏合剂<sup>[3]36</sup>。在这一点上,波伏娃极大地发展了由萨特提出的“唯意志”自由论,避免了将人的意识与生活体验完全一分为二的做法,在承认人具有选择与行动自由的基础上,将现实生活中可能对个体施加影响的因素纳入考量,从而更具体贴切地描述、分析女性的处境。

第二卷开篇,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sup>[4]367</sup>。她借用“存在先于本质”来讨论性别身份,指出女性不存在先天预设的本性或本质,能够不断填充、改变、创造自己。波伏娃不否认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但是反对用两性生理差别来确定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强调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女性无法有所作为的状况。波伏娃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来描述女性所处的情境:女性不仅在身体意义上被异化,也在社会意义上被异化。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局限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妻子和母亲身份是女性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和存在价值这一规训通过法律、习俗、信仰等渗透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单一的身份定位让女性被排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之外,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维系自己及子女的生存<sup>[4]111</sup>。最终,女性使自己适应了这种退化的生存状态,迫于外部压力形成的心理特征最终内在化为女性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将“自为”与“自在”概念引申、对应到两性状态上:男性作为“自为存在”,能够通过发挥其自主性和超越性,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进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女性则是“自在存在”,在长期以来僵化不变的身份定位中难以确立自身。在波伏娃看来,女性必须清楚认识自己的处境,重新建立自我认知,主动构建自我,通过自我谋划、自我选择,在经济、道德、社会、心理层面上实现真正的独立,才能从“他者”地位中挣脱出来,实现自我拯救。

## 二、女性的生存情境

《亲爱的生活》是爱丽丝·门罗的最新作品,门罗曾说:“我希望读者从《亲爱的生活》开始读我的小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sup>[5]</sup>全书14篇小说以《终曲》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10篇构成第一部分,通过一连串故事书写平凡人的生活,表达个体的情感愿望,这些故事或多或少与旅途有关,其中隐藏着对人生的隐喻,《离开马弗里》《亚孟森》和《庇护所》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这三篇小说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门罗几乎都使用了“选择(—突破)—受阻—醒悟”的叙事逻辑,小说的女主人公均被置于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情境中。

在《离开马弗里》中,利亚从小生长在令人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她去电影院当检票员,父亲要求她“不可以看银幕或听电影里的对话。这个家庭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这样的事”<sup>[6]57</sup>,不允许她在星期六的夜晚独自下班回家,但又不愿意去接她;父亲为了让她在家帮忙不允许她去上中学;她离家出走,只有母亲为她四处奔走,她的父亲与弟弟们并不出来找她。大雪封路的闭塞小镇、父

权统治下的传统家庭、刻板严厉的父亲等构成利亚的现实情境的一部分。然而,利亚的性格与她身处的家庭环境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了第一次逃离:跟牧师儿子私奔。她虽然确实收获了短暂的幸福,但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中,不得不面对自己千疮百孔的婚姻:她的丈夫终日酗酒跳舞,将抚养孩子的重担扔给了她。这样的情境直接促使她第二次逃离:和一位牧师发生了婚外情。然而,这使得她再一次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丑闻传出,闹得满城风雨,她被牧师夫人扫地出门,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她的丈夫转而选择了一位女牧师。通过利亚两次失败的逃离,门罗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完全、不成熟的女性独立意识:利亚具有相当矛盾的心理特征,她不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庸,也有反抗的决心和勇气,却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如果没有男性的认同,她便无法建立对自我的认同,这导致她不断地依附于男性,一次次将自己置于男性主宰的人际关系中。

在《亚孟森》中,气候严酷的亚孟森小镇及其中一系列人事物构成了主人公薇薇安·海德的现实性。薇薇安和福斯特医生的关系是波伏娃笔下象征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异性恋关系的文学写照:女性是被动的,男性富有侵略性和掠夺性。福克斯医生从登场之初就被塑造成一个傲慢刻薄的男性形象:他以年长者的口吻与薇薇安对话,话语中处处是陷阱与讽刺,“只要他愿意就能把人骂得体无完肤”<sup>[6]32</sup>。在与他的相处中,薇薇安身上充满了顺从与隐忍的女性气质:她本已和玛丽约好去看《围裙号》,当福克斯医生邀请她到家中吃饭,她便听从他的意见对玛丽爽约了;当福克斯医生在用餐时用一系列问题让她感到难堪,她宁可撒谎也不愿直言;当玛丽主动登门为两人献上情人节表演,却遭到福克斯医生无情驱赶时,她虽然感到愧疚与不安,但没有说一句话,甚至在心中不断为福克斯医生的粗暴行为找理由……尽管她善于察言观色,思维活跃,早就看清福克斯医生的为人,但因为对男性气质的崇拜和敬畏,选择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任由福克斯医生在两人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压迫性的关系导致薇薇安失去对情感走向的把控,最后被福克斯医生不明不白地悔婚。通过展示二人的关系,门罗不仅将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描写得细致入微,而且提醒读者如果女性一味地妥协,只会进一步丧失话语权,并最终沦为男性的附庸、无法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

《庇护所》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座小镇上。当时,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从美国爆发并蔓延至西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进行着全方位的斗争。然而,小说中的“我”在道恩姨妈家所看到的情景,却全无“不同寻常的解放和反抗的气息”<sup>[6]388</sup>。道恩姨妈处于她无权塑造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呈现出被给定的状态,由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维持运转。门罗将道恩姨妈塑造成一位温柔和顺的贤妻、一位“房间里的天使”,她选择或默许了这样的情境,向丈夫妥协,事事以丈夫为先,正如小说中“我”母亲评价的那样:“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丈夫”,“她的生活就是围着那个男人转”<sup>[6]389</sup>。波伏娃并不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的妻子和母亲身份有益于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她认为传统婚姻维护的始终是男性的利益,被以法律、规范等形式固化,以至于成为一些女性的生存意义。在《庇护所》中,门罗对贾斯珀姨夫这一角色的塑造反映了这一点。贾斯珀姨夫是家庭绝对的掌权者、控制者,把道恩姨妈的一切付出当作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妇女软弱无能的表现,对妻子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例如,当新来的邻居邀请道恩姨妈来家中喝茶,道恩姨妈虽然极度缺乏社交经验却明白应当礼尚往来,贾斯珀姨夫则表现得非常不高兴:“不是不喜欢这对邻居,他只是不喜欢有人来他家,无论如何都不喜欢。”<sup>[6]394</sup>这里门罗使用了“他家”而不是“他们家”,尽管夫妻俩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多年,贾斯珀姨夫并未将妻子当作家人,而仅仅是房子里的一件所有物,妻子始终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道恩姨妈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尽男性的凝视和束缚,放弃本该拥有的自由而致力于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揭示了女性如何“形成为”她的性别。

### 三、女性的成长

波伏娃宣称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超越性,应该作为真实的主体而生活,并允许他人也如此生活。在她看来,父权制社会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女性局限在给定的身份地位中并剥夺其超越性的做法,是不道德的。《离开马弗里》《亚孟森》和《庇护所》这三篇小说展现女性不同程度地突破父权制社会给定的他者地位,重新找回超越性或在此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成长历程。这些女性角色的成长都是通过困在困境面前的自我拯救和自我突破实现的。

在《离开马弗里》中,利亚的离经叛道由从小束缚她个性发展的宗教教义和时刻将她置于边缘地位的家庭环境塑造,感情方面的匮乏为她后来所托非人的遭遇埋下了伏笔。她两次失败的逃离是其自我意识并未完全形成的结果。在波伏娃看来,女性如果想要自为存在,就不应该满足于肤浅的解决方法,如进入婚姻或生儿育女,这些解决方法看似改善了女性的处境,实际并不能使女性逃脱父权制的束缚,也不利于女性实现人格独立进而获得自由。她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女性应当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争取经济独立,并通过共同努力对她们的处境做出政治分析,再做出选择来突破现实情境。显然,门罗也认可这一观点。在小说的结尾,经历了一系列挫败的利亚终于停下来反思并重新认识自己,尽管还会对过去发生的种种感到伤感,但她对未来充满信心:“不用感到尴尬,情况不像看上去那么糟。我只是会不自觉地哭起来。哭泣没什么坏处,只要你别把它当作职业。”<sup>[6]71</sup> 她开始以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独自面对生活,在康复中心找了一份帮助癌症患者康复的工作。门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表示,她很欣赏《离开马弗里》中那个走出来的女孩,希望她和那个妻子已经去世的男人能以某种方式在一起<sup>[7]</sup>。尽管利亚的两次逃离均以失败收场,但门罗认为这是她在进行自我反思并最终实现自我突破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可以说,门罗在利亚的身上寄予了希望,让人期待独立意识觉醒的她焕然一新。

在《亚孟森》中,薇薇安同样经历了两次选择,并且其真正的成长是从第二次选择开始的。被福斯特医生抛弃在前往多伦多的车站后,薇薇安再一次遇到了玛丽。两人同样是被福斯特医生羞辱、伤害过的人,但相较于薇薇安的迷茫悲伤、对福斯特医生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玛丽展现出了极为乐观积极的态度:“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sup>[6]54</sup> 受到玛丽的鼓舞,薇薇安做出了第二次选择:不再沉湎于过去,放下这段失败的情感经历,与另一位男性步入了琐碎但真实的婚姻生活。尽管多年之后她与福克斯医生重逢时依旧感到迷茫与困惑,但她接纳了因为一次失败的选择而蒙屈受辱的自己。可以说,薇薇安是门罗笔下较为典型的探险家式主人公,亚孟森是她选择的第一个目的地,气候严酷、氛围压抑的亚孟森小镇不仅象征着她第一段凄凉收场的爱情经历,也象征着她尚未拥有独立人格而不得不受制于男性的艰难处境。通过展示她的受辱经历,记录她修补破碎的内心、进行自我反思进而重新认识自我、谋求自我拯救的途径,门罗再现了女性从拥有自我意识到拥有独立人格的自我探寻过程。

《庇护所》的氛围在贾斯珀姨夫的音乐家姐姐莫娜的葬礼上达到了高潮。起初道恩姨妈感到高兴,因为丈夫与莫娜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如今他不必再为这层关系而生气。然而,在姐姐的葬礼上,贾斯珀姨夫再次表现出独断专横的一面,他试图掌控一切、展示自己的男性权威:不允许姐姐的同行演奏,要求自己家的女仆在姐姐的棺材前弹奏管风琴。这一次他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唱诗班的涌入将他困在圣坛上出尽了洋相。面对这一幕,道恩姨妈的反应却不同于以往:“或者也许她在贾斯珀姨夫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留意到了他脸上失意的阴影。也许她第一次意识到她不在乎。完完全全,一点儿都不在乎。”<sup>[6]104</sup> 小说最后,道恩姨妈这位“房间里的天使”

终于较为鲜明地表现出了自我意识,向着摆脱男性给定的他者地位、获得自我认同迈出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步。

#### 四、门罗的女性观

作品都受到作家自身所处时空背景与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门罗见证了几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但与要求彻底摆脱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同,她不像珍妮特·温特森在作品中描绘父权无法控制、所有规则失效的“空中之城”<sup>[8]</sup>,而展现出了更为温和的性别文化观念,这显然受到她自身生存情境的影响。门罗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小镇边上,这形成了其小说中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故事大多以安大略省的小镇为背景,呈现浓厚的加拿大民族性。由于长期生活在小镇边上,文化的边缘性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她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在她开始写作并发表第一部小说集时,文化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浪潮席卷加拿大,《塔玛拉克评论》《加拿大文学》《加拿大论坛》等刊物先后创立,并成为门罗早期作品的重要出版商。这对其作家身份的确立和写作信心的树立至关重要,从此,门罗着眼于女性的生存状态,塑造了许多试图摆脱父权制束缚的小镇女性形象。

从门罗对女性命运轨迹的刻画方式可以看出小镇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浪潮对她的双重影响。一方面,门罗在进行角色塑造时,时时以超脱的态度关注她们生存情境中的现实性,但并不提供单一的价值判断,克制冷静地还原了20世纪小镇女性较为典型的生活状态,尊重不同女性个体针对自身情境作出的选择,试图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探求一条在反抗与认同之间曲折前进的务实道路。在她看来,女性在打破原有的情境后必然会面对种种诱惑,必须做出新的选择,要在与他人的交互中逐步认识自己的情境、建立自我认知,并通过选择与筹划实现自身价值,走上艰难却充满希望的道路。而另一方面,门罗在小说中没有放弃对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道德的维护,这一点在《离开马弗里》中得到了体现,利亚的两次选择体现出女性被欲望所诱惑以至于对自我的追寻偏离了伦理道德的情况,门罗显然并不认可这一做法,认为这是对时间和生命的浪费,并且是对真正重要的事物的视而不见<sup>[6]98</sup>。

门罗以“家庭主妇作家”的身份为读者所熟知,作为家庭主妇,她需要照顾家人起居、准备一日三餐等,因此,她的写作必须抽空进行,又时不时被各种繁杂事务所打断。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总是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婚姻、家庭的阻力,这在如今的社会依然屡见不鲜,在门罗开始写作的年代则更为严重,她甚至曾在访谈中直言:“我想我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写作,为了能静下心来,把我的注意力转回到这件重要的事上来。”<sup>[9]</sup>因此,门罗相当理解那些步入婚姻、承担母职的女性,对于道恩姨妈这样被男性牢牢控制的女性更是不乏同情与怜悯,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完全赞同一味迎合男性以至于丧失自我意识的存在方式,更并不意味着她试图劝服女性和父权制握手言和。正如她自己从未因生活的艰辛而停止写作、放弃作家身份,女性选择压抑自身换取平静生活终究不是确立自我存在的正确方式,在妥善处理他者身份和追寻自我中间寻求平衡,或许是像道恩姨妈这样的家庭主妇摆脱困境、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经之路。

综上所述,尽管门罗的女性主义作家身份并未得一致认同,但她始终致力于书写平凡女性的生存情境,通过展现当代女性为摆脱父权制价值观的束缚、为寻求自由与超越所做出的努力,对女性如何摆脱他者地位并最终实现独立与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门罗笔下诸多自为存在的女性角色,如利亚和薇薇安,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自己的意愿、理想和行动带来的成败荣辱中成长起来,朝着自我设计的未来前进,并在与不同人的交互中,逐步摆脱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确立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朝着实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独立而努力。即便是像道恩姨妈

这样几乎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门罗也对其摆脱困境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尽管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留下了巨大的想象与思考空间。可以说,门罗从不用单一的观点来阐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是在作品中将生活的复杂性和价值观的冲突原原本本呈现给读者,强调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和切实行动,才能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同时,门罗也不沉湎于唯意志的“绝对自由”,而是在坚守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强调人应当用理性去追寻生命的价值,也必须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

#### 参考文献

- [1] 王祖友. 中国学者眼中的加拿大文学:刘意青教授访谈录[J]. 英语研究, 2014(2): 16 - 19.
- [2] 刘静. 国内艾丽丝·门罗研究述评[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4(4): 82.
- [3] 提德. 导读波伏娃[M]. 马景超,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4] 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 [5] 张悦然. 门罗的晚期风格[J]. 文艺争鸣, 2020(4): 161 - 166.
- [6] 门罗. 亲爱的生活[M]. 姚媛, 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 [7] 高静.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 156.
- [8] 冯雨欣, 仵康. 权力及其解构: 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权力空间[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2): 78 - 85.
- [9] 门罗, 麦卡洛克, 辛普森, 等. 小说的艺术: 爱丽丝·门罗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14(4): 185 - 202.

## Beyond the “The Second Sex”: An Analysis of Women’s Growth in Munro’s Novels

WANG Yu-tong, HUANG De-z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lice Munro focuses on everyday life and captures the subtl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In her novels, she portrays a number of female characters who are “being-for-itself”, depicting their living situations and showing their life journey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sense of subjectivity and achieving self-transcendence through self-reflection. In *Dear Life*, Munro presents three typical situations of female existence in the 20th century, showing how women break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situations to grow, expressing a concept of women similar to the existentialist view of women in Beauvoir’s *Le Deuxième Sexe*, and providing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women to realize their self-worth.

**Key words:** Alice Munro; *Dear Life*; Simone de Beauvoir; *Le Deuxième Sexe*

〔责任编辑:何敏敏〕